

后浪出版公司

AMERICANS AND CHINE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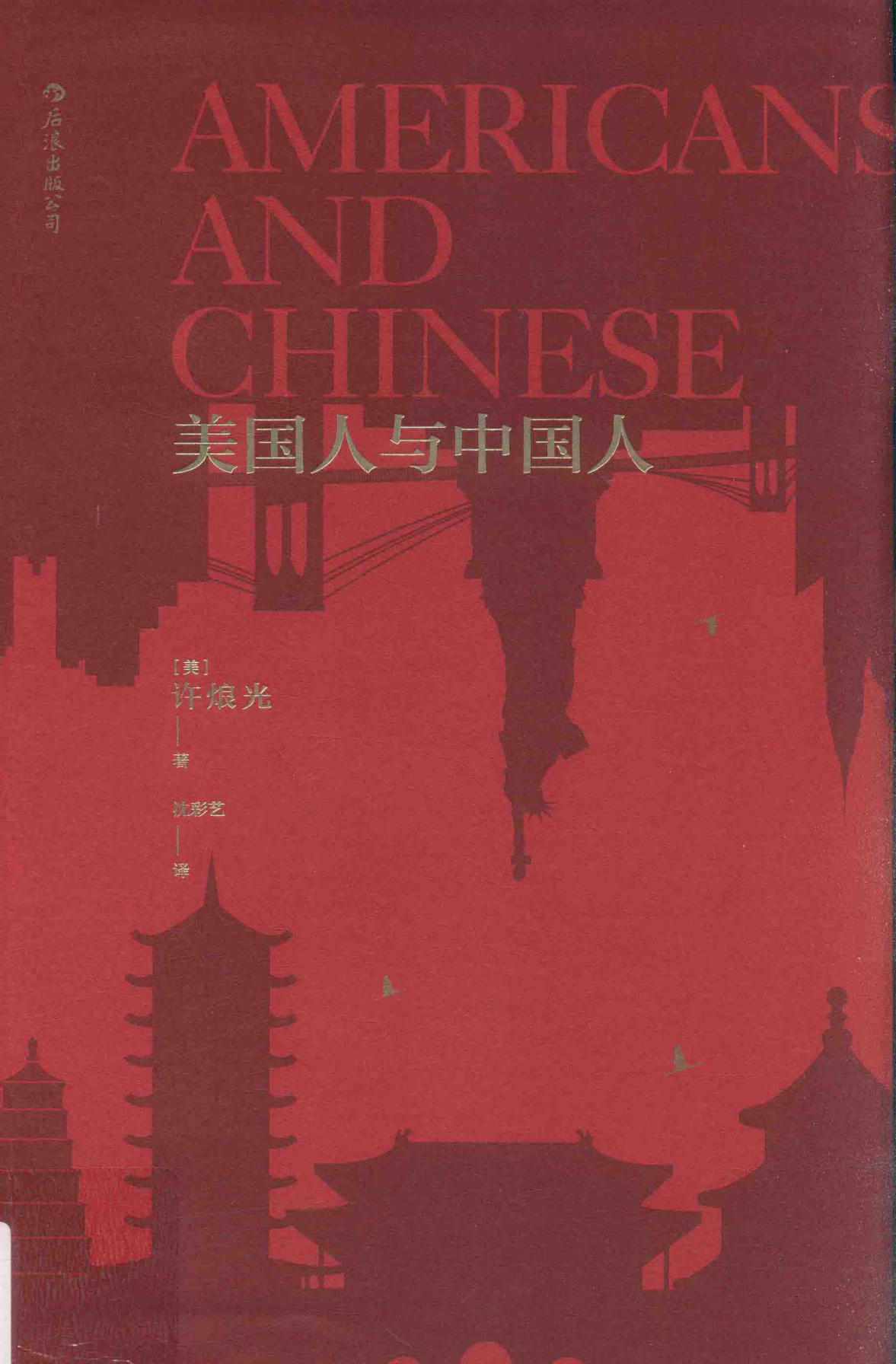
美国人与中国人

[美]
许烺光

——著

沈彩艺

——译



美国人与中国人

[美]

许烺光

著

沈彩艺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人与中国人 / (美) 许烺光著; 沈彩艺译.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213-08060-9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7-207

I . ①美… II . ①许… ②沈… III . ①文化心理学—
对比研究—中国、美国②民族性—对比研究—中国、美国
IV . ① G05 ② C955.2 ③ C955.7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8719 号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pyright © 1981 by Francis L. K. Hsu.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Ginkgo (Beijing) Book Co., Ltd.

美国人与中国人

[美] 许烺光 著 沈彩艺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筹划出版: 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 吴兴元

责任编辑: 潘海林

责任校对: 张志疆 陈 春

特约编辑: 刘晓燕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李渔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655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1

字 数: 450 千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8060-9

定 价: 99.8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前言

1.

许烺光先生这本《美国人与中国人》，可被归入国外观察家解读美国人国民性格的出版大类，该系列以往的知名作者还包括：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①和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②、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③和弗朗西斯·格伦德（Francis Grund）^④、托克维尔（Tocqueville）^⑤、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⑥、于果·明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⑦、乔治·桑塔耶拿

① 克雷夫科尔（1735—1813）：法裔美国作家和博物学家。1782年，他在伦敦将12篇文章编辑后出版，即是使他扬名一时的《一个美国农民的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② 雅克-皮埃尔·布里索（1754—1793）：法国政治家、记者，大革命期间吉伦特派领袖。

③ 弗朗西斯·利伯（1798或1800—1872）：德裔美国法学家、政治哲学家。他曾编撰《美国史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Americana*），而完成于美国内战期间的《参战政府密码》（*Code for the Government of Armies in the Field, 1863*）被视为史上首部概述政府在参战期间的行为规范的著作，为签订《日内瓦公约》奠定了基础。

④ 弗朗西斯·格伦德（1805—1863）：德裔美国记者，著有《美国人及其道德、社会与政治关系》（*The Americans in Their Mo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1837*）。

⑤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著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美国游记》等。

⑥ 詹姆斯·布赖斯（1838—1922）：英国法理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著有与《联邦党人文集》《论美国的民主》齐名的《美利坚合众国》（*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1888*）一书。

⑦ 于果·明斯特伯格（1863—1916）：德国著名心理学家、美学家、应用心理学之父。1889年他受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之邀到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898年、1908年先后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哲学学会主席。

(George Santayana)^①和丹尼斯·布罗根(Denis Brogan)^②。本书与这些先贤经典同样热心于发现美国带给全世界的意义和征兆,而最了不起的是,它们都意识到美国的祸福与全人类命运利害攸关。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有一段名言:“我在美国看到的超过了美国自身持有的。我所探讨的,除了民主本身的形象,还有它的意向、特性、偏见和激情。我想弄清民主的究竟,以使我们至少知道应当希望它如何和害怕它什么。”

在数百篇经典中回响的、始终带有迫切感、时而焦虑时而又自信的旋律,同样响彻在许教授这本兼具独创性和洞察力的作品里。与大多数被我们称为“文化社会学”的早期作品相比,《美国人与中国人》一书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征:首先,过去几乎所有评论家和观察家都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爱默生用来评判英国的那条准则——成功与否是对一个国家的最大考验。每一个人都被迫承认美国的出现是一次重大的胜利——4000万前往“新世界”的移民就是最好的证据;大多数人承认它是一次政治上的胜利;还有一些人——如托克维尔和詹姆斯·布赖斯等最优秀的学者——由衷地相信它是一次道德上的胜利。在许多人眼中,美国俨然成为未来潮流的代表,这股潮流业已在拍打欧洲的海岸。关于美国的成长及其影响力的扩张,一些评论家正怀着警惕的关注,不少人准备听之任之,舆论主流表示欣慰,而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现出对它的顶礼膜拜。

如今,美国人自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对他们成功的“事业”(不再是“实验”)充满疑虑,其他人则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早从18世纪起,哲学家就在郑重地争论:美国的出现是错误的吗?历史上是否曾经出现如今天这般广泛的质疑和深刻的觉醒?曾经令克雷夫科尔和托克

① 乔治·桑塔耶拿(1863—1952):美籍西班牙裔的自然主义哲学家、美学家,美国美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与文学批评家。

② 丹尼斯·布罗根(1900—1974):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家,著有《美国人的性格》(*The American Character*, 1944)、《美国政治》(*Politics in America*, 1954)等。

维尔、阿尔伯特·戴西 (Albert Dicey)^①和詹姆斯·布赖斯满怀热情地注视美国不断上升的国力和影响力的那些因素，为什么会使当代的评论家和观察家忧心忡忡，甚至心怀恐惧？在过去，多数国家乐见美国制度和社会改革的进步，尤其当它们发生在政治及经济领域时，为什么现在“美国化 (Americanization)”一词已经逐渐带有贬义色彩？

许教授这本书是最早一本回应这种前景，并讨论相关心理因素的重磅之作。事实上，简明版的《美国人与中国人》在20年前就已预测到美国的新变化及其多样的表现形式——从种族暴力、代际问题到军事冲突、政治压迫和新殖民主义。相对于本书冷静和不偏不倚的分析、对比及警示，薛利伯 (Servan-Schreiber)^②式的、对“美国化”的批判——主要针对美国公司的扩张——显得相当浅薄。在许教授看来，美国向西欧输送的经济利益和技术模式，若与美国政治及军事力量、社会风俗和价值观向全球的输送相比，简直可说是无足轻重的。

许教授对美国人的性格分析区别于以往同类作品的第二个特征，要从这本书自身去寻找，而不能据各种表面现象加以推断。以往解读美国人性格的大多数著作几乎全都始于大抵相同的西方文化前提，又得出一模一样的推论。我们在英国、法国及德国学者的经典之作中只看到对“家庭”的讨论——时而是“家庭”争吵，时而是“家庭”庆典，所涉及的永远是常见的问题和特征。观察、设问和预言总是摆脱不了西方社会文化框架，同时受到该社会及文化参与者的利益限制。亨利·亚当斯 (Henry Adams)^③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写道，若要确切地阐释历史法则，必须以美国经验为基础，因为美国既总结了过去，又预示着未来。他所指的当然是西方的历史法则，因为

① 阿尔伯特·戴西 (1835—1922)：英国法学家，曾对英国国际私法做出重大贡献。

② 薛利伯 (1924—2006)：法国著名记者、政治活动家，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美国的挑战》(The American Challenge)，指出欧洲经济之所以落后于美国，主要不是由于技术和资源，而是由于企业管理远远落后于美国。

③ 亨利·亚当斯 (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小说家，曾出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的家族在美国素有“第一王族”之称，与美国民主体制的确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美国经验不可能用来解释中国、印度、非洲各国，乃至俄罗斯的历史。这些对西方文化的偏颇理解，并非仅仅出自不可避免的地方观念，而是由文化的局限所造成。欧洲评论家对美国人习以为常的一切太过熟悉，他们的学术假设即使不是全然美国式的，也与它相当接近；得出的结论就算不被欣然采纳，也很少会带来惊喜，不太可能超越美国经验——他们对美国的体验虽然是间接性的，却并不全然陌生。许教授在这本书中审视了那些欧洲学者因太过熟悉而忽略的现象，提出他们因害怕被视为离经叛道而不敢提出的问题，基于一段长达3000年而非仅仅300年的历史而设定理论假设。——在他之前，只有朴弄杨（No-Yong Park）的《东方人眼中的美国文明》（*An Oriental View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一书堪与这本著作相提并论。

托克维尔，作为最出色的评论家之一，虽然意识到西方视野的局限性，但却无法从中挣脱。他写道：“我愈是细致地观察今日我们所处之世界，便愈发觉我们正面临惊人的多样性，愈是相信被我们称之为必要的制度，不过是我们早已习惯的制度而已。世界的多样性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的确如此，世界的多样性比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的想象要广阔得多。早期的社会学家从东方寻找西方社会的参照物，例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伏尔泰《风俗论》的开篇以及奥利弗·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大受欢迎的《中国旅人的伦敦社会素描》（*Sketches of London Society by a Chinese Traveller*）。然而，上述作品只能被称为戏谑之作，书中的东方圣贤一律被描绘成披着波斯或中国丝绸的法国哲学家。许教授笔下的东方不是这样虚假的东方。“中国”不再仅仅作为文学上或戏剧化的参照物，而是与美国社会同等重要的研究和比较课题。

与浩如烟海的阐释美国的作品相比，《美国人与中国人》一书的第三个特征是：在阐释美国现状时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以最古老的国度和新近涌现的强国互为对比。托克维尔时代用来形容美国的一切，在当前都可以用来形容中国：研究者不得不关注它的一切，

试图回避它的经济学家简直无法进行任何演算，政治家为它不可预测的潜力而大受震撼，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纷纷根据它的现状修正正在成形的理论。唯有托克维尔或利伯那样敏锐的头脑，才能预见西方世界将如何被这个一夜间就在大西洋彼岸崛起的全新国度改变，正如唯有借助托克维尔和亨利·亚当斯那样的历史观念及智慧，学者们才能预测俄罗斯今后的伟大。人们很容易想象的是，拥有3000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的中国的精神焕发的全新面貌，将会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一如当年欧洲人曾对朝气蓬勃的美国充满遐想。毫无疑问，出生于中国的许教授不会犯我们过去的错误，把中国当作可资美国参考的历史化石。研究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性格，是因为它将给我们以及整个世界带来丰硕的收获。

2

一个世纪以来，《论美国的民主》在介绍美国的诸多著作中始终是当之无愧的权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托克维尔紧紧抓住一个核心议题，并在美国人思想和行为的罅隙角落里加以探究。平等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它无法解释一切问题（例如奴隶制），它也使问题得以暴露。许教授同样抓住了一个核心议题——个人主义。许教授所描述的个人主义，或许与平等观念并无本质区别。我们从客观的角度可以认为，与其说个人主义的根源是平等观念，不如说追求平等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将个人主义作为理解美国人性格的关键，与把美国与西方相联系、又把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相区别的平等观念相比，优势在于前者更为明确。平等观念并非西方世界一直以来的特性，在19世纪80年代的西班牙及密西西比河沿岸，更不是当时社会通行的原则。而自文艺复兴以来，个人主义一直是且仍然是使西方区别于东方的最为鲜明的特征。没有人能够质疑特定的环境和历史已将美国塑造为个人主义社会的一个典范，它充分展示出个人主义的优势及破坏性。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美国毕竟是所有国家中最接近欧洲的一个，它的人民和文化都直接承自欧洲。在语言、法律、文学和政治领域、英格兰传统占据主导地位；在宗教、教育、社会行为、道德观念和社会心态上，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及犹太人施加了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位人类学家想要选择一个西方民族与中华民族相比较的话，美国人当然是最佳选择。

许教授同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追溯个人主义的影响。他为此深入了解美国的政治体制、刑法、人们看待客观世界的心态以及外交和战争行为。他也仔细地剖析了亲子关系、对待祖先与后代的心态、青年社团与老龄生活、性在日常生活及文学艺术中的作用、犯罪率、对成功及权威的判定、游戏和体育心理，以及其他一些人类行为。在上述的所有领域里，他把美国人的优缺点一一与中国人相比较：美国人的危机意识与中国人的安全感；美国人的独占性与中国人的包容性；美国对下一代的爱护与中国人尊敬长辈的风俗……许教授认为个人主义可以解释为什么竞争会渗透到美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孩子要争夺父母的关爱；父母要抢夺子女的关注和认同；美国女性关心美容和时尚是为了每一天都能让丈夫有新鲜感；美国男性焦虑地试图证明自己是成功人士，有资格获得妻子的爱和尊重；从企业到大学，每个组织内部都充满着为地位和认可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教会为了争夺会员和捐款，如角逐中的企业一般竞相夸耀自身的兴旺。

许教授确信个人主义足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不仅决心要赶上自己有钱的邻居，而且显然还不得不超越他们。他们的决心是以下这些现象的基础：广告工业的追梦乐园；参与一切事务的热情；一旦发现另一个将带来更高地位或更快速的社会及经济回报的团体，就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俱乐部、社团和教会的心态；持续地从一些邻居旁边搬到另一些条件更好的邻居旁边，从一个城区搬到另一个更时髦的城区。个人主义同样说明为什么每个美国人都积极投身政治，相信所谓民主就是任何一个成年男女都具备一定影响力，每个人都

有被倾听的权利，即使对方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每天都会收到两三千封建议信或劝告信。“每个人都有权利幸福”，是个人主义营造的至高幻象，人们相信幸福的权利不但是一切法律之根源，更明确受到各州宪法的保证。所谓幸福是指满足每一个人的愿望（甚至幻想）。这必然带来不断尝试、改变和进步的压力，不然人们又怎能获得幸福和成功？它又必然带来一种观念，即改变总是好的。

许教授在研究美国人的生活时，在各个层面都看到深刻的不安全感——它来自美国人自我依赖或仅仅依靠核心家庭成员的观念。他认为，美国人缺少的是一个锚，它本应联系着比个人及核心家庭更大的存在，与相互依赖的人际网络，与家庭、家族及乡邻，乃至与过去和未来相连。美国人缺少这样一个锚，因此才不安、空虚，缺乏成就感和幸福感，才会为了那种从逻辑上看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虚幻成功而放弃家庭、信仰、事业、朋友和同志。正因为美国人缺少安全感，他们才被迫不断地证明自己——孩子们要证明自己更聪明、更强壮、更受同伴喜爱；男人要证明自己有女性无法抵抗的魅力；白人时时刻刻想表明自己远比黑人优秀。

3

许教授以批判眼光来审视美国的个人主义，但并未错误地把它当成一种恶，更不认为它是不可避免之恶。自我依赖之中充斥着危险因素，然而无论是对个体或社会而言，它也伴随着不少优点。有独立思想的人在这一信念下不但会努力改变自身的命运，更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而此种对政治（或说民主）的期待，尽管有可能失败，却比中国人在过去许多世纪里建立的任何制度都更加有效；至于平等观念，则被中国人充分运用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之后的共产主义革命。许教授认同美国先进的教育理念，认为应由学校适应孩子而非由孩子适应学校；美国高等教育体制固然有不少缺点，却培养出了更高比例的学者、科学家和政治家；美国人的家庭生活虽然存

在危机，却提倡两性平等，鼓励年轻一代自食其力。

上述优点或许比缺点更为重要——对于美国人自身而言。但是，不受约束、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又将给美国之外的世界带来什么呢？显然，在历史转折的当下，美国人的不安全感没有体现在美国国内，而是首先表现在世界舞台上。正如它内部的每一个个体，美国缺乏安全感、竞争欲望强烈，而且极其冷酷无情。美国人必须在一切领域一马当先——财富第一、权力第一、军备第一、登月计划第一。美国体制不仅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体制，而且必须要在他人眼中成为最好的；倾向另一种体制即为叛国，任何竞争者的存在都被视为是对美国的大不敬。美国标准必须成为世界各国的准则——包括欧洲、拉丁美洲，乃至亚洲各国。这样一来，美国理所应当成为亚洲的强权，而中国成为美洲强权或者仅仅成为东南亚强权的念头，则根本提也不要提起；美国第六舰队必须行使统御地中海的正当权利，而俄罗斯舰队统御加勒比海则完全是痴心妄想；美国军队可以在危地马拉和圣多明哥通行无阻，而俄罗斯人认为他们有权控制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按：于1992年解体）却要归于某种邪恶的念头。美国人甚至认为有权在他们选择的任何一片海域引爆原子弹或投掷神经性毒剂，因为世界决意让海洋属于美国人，正如上帝决意让月球属于美国人一样。信奉个人主义的美国人耗尽一生在寻找安全感，却总是找不到；而美国为了获得这种飘忽不定的安全感，不惜赌上它的物质财富、社会成员及道德伦理。美国永远不可能获得这种安全感，因为它的手段不是平等、合作，而是居高临下，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在这一点上，许教授发表的观点有几分末日启示的意味。他的著作使人联想起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①的警告，“将强大的军队派往世界各地战场……正是西方缺少安全感的可悲的终极证明。

① 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美籍德裔犹太人，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毕生致力于修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切合西方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精神处境。

除非社会凝聚力得到重建……没有目标的个人主义会倒向极权主义，以人民的自由交换他们渴求的决断力和情感安全。”他总结道，“美国人的使命是减少自我依赖，同时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赖，并以此来抵制上述倾向。”

许教授是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不会忽略任何社会特征都有其深刻的根源。他显然不相信美国人会用复杂奥妙的中国式互助精神来替换深入美国社会骨髓的个人主义。通过在每一细节上对比美国人与中国人的行为，他对美国的社会制度及民族性格提出批判。这一批判全然不同于美国人习以为常的那些批判——它不仅与旧世界的理想背道而驰，并且建议要全面修改它的模式。许教授明确指出美国及西方世界正面临的问题不是偶然的，而是西方惯例、标准和价值观的合理产物。它们不可能通过政治符咒，甚至内部改革而获得解决，只能通过伦理的进化而有所改善。假如许教授谈到的调整需要某些超出美国人经验的奇思怪想，这种言论不但不会带来助益，反而会让美国人感到绝望。幸运的是，情况并非如此。许教授没有就这一点过度纠缠，而只是希望美国人民摒弃过度自私的个人主义，恢复对自然资源的维护，对他的邻居及其他宗教、种族给予尊重，同时停止美国人在道德上优于其他民族的幻想。他的建议与大多数美国人信奉的宗教教义不相抵触。也许，要拯救地球和人类，美国人要做的仅仅是回归其原有的伦理精神传统而已。

亨利·斯提尔·康麦格^① (Henry Steele Commager)

1970年于马萨诸塞州艾摩斯特市

^① 亨利·斯提尔·康麦格(1902—1998):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现代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一生中出版了《美国人的智慧》(*The American Mind: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Thought and Character since the 1880s*)和《理性帝国》(*Empire of Reason: How Europe Imagined and America Realized the Enlightenment*)等40余部专著。

自序

我出生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曾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战场，小时候常听老人说起俄军和日军在战争中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我在一个小镇上学，在随后的游历和工作中逐渐认识了那时遍地兵匪、饥荒与传染病肆虐、学生运动与内战不断的中国，以及西方势力与日本对它的虎视眈眈。

奇怪的是，这些艰难困苦似乎并没有影响我和大多数同龄人在个人生活领域里过一种优哉的生活。我们在婚宴上大吃大喝，欣赏婚礼前一天由乐师前导、两人合抬、沿街巡行的艳丽精美的新娘嫁妆；在露天集市里津津有味地听人说书唱戏；被地方戏剧、皮影戏里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深深吸引。那时的我们年少无知，一些人常常逃学。看蒸汽机车呼啸着穿行于当地的火车站最让我们兴奋不已。车站里的各色旅客、小贩和身着制服的乘警与乘务员，也令我们着迷。

最好的时光还是春节，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节日——包括我们已经去世的祖先。我们能吃上精美的年夜饭，穿上新衣四处炫耀，就连小孩也被允许作小额的赌博——这时小孩手里多少都有些父母和亲戚给的压岁钱。压岁钱像是中国版的圣诞礼物，不过是单向的，只能由长辈赠予晚辈。

当然，生活中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瘟疫来袭时，人们举办祈神大会，在门上张贴辟邪符咒；遭逢旱灾时，人们列队向龙王求雨；土匪横行乡里、抢夺邻里财物时，老百姓把大门门上，蜷缩在门后；

军阀混战逼近时，学校停课，商店关门，短则几日，长则几周。直到胜利的一方开始执政，学校才再度开学，老师学生一起加入欢迎的游行队伍；老百姓涌去村外观看枪决，犯人有时是谋财害命的土匪，有时则是抨击时弊的记者；他们也会挤在一起望着一辆辆载着军阀及卫兵的汽车从街道上呼啸而过。然而，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数人与生活的劫难擦肩而过，没有受到真正的惊吓。食物匮乏时，我们忍饥挨饿；洪水来了，我们就四处逃难。人们既要躲避嚣张的兵匪，也试图远离腐败的官员，有时不得不靠行贿才能行使正当的权利。人们谨小慎微，尽量少说话，以维系正常的生活轨迹。

中国的事态日益走向严峻。骚乱更加频仍，外界压力与日俱增。在我从哈尔滨一所高中毕业的那年，中苏矛盾引发了一场战火。在大学读到二年级时，日本占领东北，我与父母失去了联系。一年后日本攻占上海，我就读的大学被迫停课。于是，我参与了帮助难民进入国际难民营的工作。1933年我乘船离开上海前往东北，在那里最后一次见到我的父母。我在到达大连港时被拘留拷问。两周后，我扮成一名劳工，逃离东北前往北平，在北平恰好见证了日本入侵华北。接下来的4年里，日本士兵、平民及其朝鲜附庸在中国境内作威作福，肆无忌惮。中国学生游行示威以抗议当局的不抵抗，却遭到手持木棍、水龙头和刺刀的警察的残酷镇压。1937年，在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我因为获得英国庚子赔款奖金，乘一艘英国军舰离开了上海。

之后的两年可算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安静宜人的英格兰学习之余，我不但游历了英格兰以及苏格兰，还有幸到法国、比利时、德国和丹麦等地度假。1939年，欧战爆发，战火于1940年进一步蔓延到伦敦，我在世界的另一边看到过的生灵涂炭的场景又一一呈现在眼前。清醒时，我多半是在担心下一个晚上是否要如当晚一样到收容所或躲在楼梯间里过夜。1941年，在大战正酣之际，我取道南非、印度及滇缅公路回到中国。

随后的三年，除了有幸结识我的妻子维拉之外，我取得了颇为丰硕的学术成果。我在云南的一个小镇开展田野调查，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同事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在此期间，我写了两本书，就是后来出版的《祖荫下》和《宗教、科学与人类危机》。空袭、物价飞涨、瘟疫与食物短缺成为我和数百万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决定前往美国时，与那些更早来到美国的移民一样，我暗暗祈望我不远万里踏上的是一片不会受到战火侵袭的土地，在那里我可以安宁地工作，而我的孩子们也不用再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那时，距离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只差9个月。

通过简述我的人生经历，我希望读者了解我撰写此书的初衷是记录个人的生命历程。现代人已经进入了一个处处是战争前线的时代，一场局部战争就可能埋下毁灭世界的种子。在20世纪60年代接近尾声时，美国面临许多内部危机，而且按弥尔顿·艾森豪威尔博士^①（Dr. Milton S. Eisenhower）领导下的国家暴力犯罪原因及对策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的说法，这些内部危机的危险性绝不亚于“外部威胁的任何一种组合”。时间紧迫，形势危急，只要有任何切实的改进现状的希望，任何一个有想法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尽其所能，去发掘那些将美国人逼入当前状况的基本推动力。

我算是一个边缘人。我在一种不崇尚变化的文化里出生长大，大多数人的生命轨迹几乎是可以预测的；而我目前工作、生活于其中的则是另一种文化：它提倡变化，认为变化即是进步，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不可能一成不变。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存在两种对立的文化互相碰撞、影响，这个人就只能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他在文化碰撞的边缘行走，感受二者共同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是一个边缘人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叙述及思考。

^① 弥尔顿·艾森豪威尔：美国教育管理专家，曾任堪萨斯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3所著名大学校长。

同时，我又是一个崇尚科学的人，努力尝试用一种客观的心态去记录、展示和解读我人生的各个方面。因此，这本书既不算是从中国人的视角看美国人，也不是用美国人的眼光看中国人。我真诚地期望此书能展现我对中美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坦诚而公正的科学分析。以我的个人生活和严谨的学术成果为源泉，我尝试着为这两种广泛的数据源建立关联，希望这对每一个个体和他们所属的社会具有意义。

我的研究工作遵循一条人类行为学最基本的准则，而许多社会科学家尚未充分理解这条准则的重要性。我相信每一位研究另一种社会与文化的学者，在试图传达他对该社会与文化的认识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自觉地成为边缘人。也就是说，他不仅要以本族人的眼光去看待该社会的风土人情、典章制度，而且还要像本族人一样去感受这些事物。否则，他就不可避免地会用自己民族的标准来推断这些事物在该社会文化中是否重要。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对于那些自认为本民族文化更为优越的人来说。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黑人声称白人教授，甚至那些善意的声援黑人的白人教授，不能教授黑人社会研究的原因之一。

人类学学者必须自觉培养起作为“边缘人”——在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词汇之前我们姑且这样称谓——的意识，才能真正认识他所研究的对象。因为即使本族文化的优越感不会介入他的研究，人类学学者深植于心的文化偏见仍会影响到他对观察对象的选择和理解。许多非印度教教徒在批评印度教圣牛文化纯属浪费时，不曾反思基督教教堂庞大的经济支出意味着什么；同样，大量西方人士试图在中国寻找宗教迫害的迹象，也是因为西方历史和当代生活中充满了与宗教或教会有关的斗争。

成为“边缘人”没有任何简单的公式可循，但是可以通过比较法入手，也就是说，学生在试图理解另一种社会文化时，应同时仔细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例如，从最简单的一个层面来看，不仅要

研究在交往中中国人与美国人对彼此的反应，还要设身处地去思考如果美国人置身于中国人的处境，他们将会实施何种行为。

在一个更微妙的层面上，对两种文化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性比较，可以为人类学学者提供客观的视角。它将降低这个学者的某种倾向，即用现实需求去评价自己所属社会的行为，而用理想标准评判他人社会的行为。例如，美国人急于了解什么原因导致了美莱村屠杀^①（My Lai Massacre）（如战场歇斯底里），以及为何没能避免这场惨剧（因为美国的最高原则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屠杀）。然而，在其他民族犯下或真实存在或道听途说的类似暴行时，我们是否会同样迫切地探究原因呢？

这种意识还会更好地帮助学者区分特定文化和泛文化。比如，所有西方记者几乎都见识过巴黎越南会议中关于会议桌形状的争论，大家把这一事件看作是“东方式”的面子之争。如果他们做了哪怕一点历史对比，他们就会认识到这类争端其实与“东方”文化毫无关系。1697年，大同盟战争^②（the War of Grand Alliance）结束后，《里斯维克和约》（the Peace of Ryswick）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最终签署，原因就是法国和罗马帝国的代表就哪一方率先进入会场的问题无法达成协议，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同时步入会场。类似的纠纷也同样发生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和1945年波茨坦会议期间：1815年，5位君主通过5个门同时步入会场；而1945年丘吉尔、斯大林和杜鲁门也使用了相同的策略。

移民看似是最完美的边缘人，但他们的“边缘状态”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间歇性地缺失。

下面，请允许我暂时重回对个人经历的叙述。20世纪50年代

① 美莱村屠杀：越战期间美军老虎部队怀疑村民掩护越共逃亡，在1968年3月16日对越南广南省美莱村（My Lai）进行屠杀。

② 大同盟战争：发生于1688年至1697年法王路易十四在位时。路易十四欲在欧洲做出大规模的扩张，因此遭到荷兰、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英国、西班牙等组成大同盟联合对抗。战争的结果是各国被逼言和，然而法国仍是欧洲最强的霸权。